

《动荡的青春》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动荡的青春》

13位ISBN编号：9787501184675

10位ISBN编号：7501184674

出版时间：2008-8-1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作者：叶维丽,马笑冬

页数：25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动荡的青春》

前言

这是一部两人口述的成长史。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和马笑冬决定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均在海外，彼此仅是初交。相识未久即共同来做这件颇为个人的事情，似乎是唐突的。然而，初次见面时几个回合的问答，就使我们明白对方的“来历”，真是“相逢何必曾相识”。打量一下对方看来年龄相仿，听口音都是北京的，最关键的还是这样几句像接头暗号似的问话：“哪一届的？”“插过队吗？”一旦“接通”了，两个住在美国波士顿的中国女人几乎异口同声：“咱们都是老三届的。”不久之后，我们就决定每个星期碰一次面，或晚上，或周末，坐下来，对着一部小录音机，“话说从前”。人到中年，想回过头去看看自己是从哪儿来的，这几乎是人“存在”的本能需要，我们也不例外。我们的回首，从记事时讲起，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们相继出国时为止。事情是中国的，而“语境”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美国的。这不但因为我们的眼光和视野潜移默化中受到了在美国学习、生活多年的影响，也因为我们身处的环境是90年代中期的美国。恰恰由于那样的时间、那样的地点，使我们的“忆旧”少了一点中年人的闲在，而多了一些困惑。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冷战”结束，世界进入资本全球化的时期。于是在美国有人宣告“历史的终结”和资本主义制度全面、彻底的胜利。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框架下，西方公众眼中的中国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基本上成为政治迫害史，在美国出版的若干部由中国人撰写的个人传记将这个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中有几本在西方造成极大轰动，有些读书人如果只看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籍，往往看的就是这里面的一本。一般来说，这些书的作者要么是历次政治运动的直接受害者，要么是受害者的亲属，他们写的主要是政治运动的惨无人道。我因为有亲友被打成右派的遭遇和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对这些内容有相当的体会，对作者们十分同情。我理解他们想把长期压抑在心中的悲愤一吐为快的心情。说实在的，他们所描写的不过是当年残酷政治迫害的一角而已，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历史，写下来都是交代和见证。但我仍然感到对那个复杂时代单一的叙述是有问题的。这不仅因为它不符合我个人观察世界的多元、分析、开放的基本态度，也因为太贴近冷战胜方的历史观(cold war victors version of history)。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大行其道的今天，这种一面倒的历史观是颇含深意的，其中的潜台词是：人类到了今天，除了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以往其他的经验和探索都是彻底失败的、毫无价值的。这个世界似乎已经不存在任何真正意义上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另类”思想和实践资源，人类真的走到了历史的终结。同时，我也发现，如果用这类书籍的说法去套我个人的历史，我就得丢掉很多令人珍视的、对我至今仍然有意义的东西。那样我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自我，讲不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了。我和马笑冬最初做个人成长史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对抗冷战后西方话语不容分说的霸权，守住自己不愿失去的历史。我是学历史的。对百年来在中国几次出现的对自己历史的全盘否定，我深感惶惑。“五四”时期曾高呼打倒象征传统文化的“孔家店”；1949年以后、特别是“极左”思潮肆虐时期，又一笔抹杀了大批非共产党人对民族和国家的贡献，以至于近年来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过去的偏颇进行艰难的反正。在今天，我们中国人似乎又面临着新一轮历史失语的尴尬。海外不去说了，即使在国内，由于中国近年来的令人目眩的飞速变化，使得有些年轻人觉得他们出生前的历史都是“前历史”，失去了参照的价值。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胡风曾经欢呼“时间开始了”，仿佛此前的历史不算“时间”。后来所发生的事情令人心酸地、也富于讽刺地证明了胡风历史观的失误。难道今天我们中国人又要第三次和自己的历史决绝吗？一个无法从自身经验中汲取精神资源的民族是可悲的。但同时，我也明白虽然不能扔掉一切，也不是什么都该守护的。我们需要认真地清理自己的历史，包括我们做过的错事、走过的弯路；我们需要理性地审视过去的时代留在我们身上的印记。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和马笑冬面临着双重的挑战：一方面我们反对全盘抹杀，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深刻地自省。这使得我们做的事情有了某种“紧张”和难度。在中国现代史上，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一样，从一出生就得到新成立的共和国的悉心塑造，也没有哪一代人的生命轨迹像我们的一样，和这个国家的命运、状态如此重合。清理这代人的历史，涉及如何评价共和国的历史。要讲这代人，就不能不讲“毛泽东时代”，不能不讲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不能不讲“革命”的意识形态，更不能不讲“文化大革命”。在海外，以暴力为特征的红卫兵运动决定了这一代人在西方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形成对照的是，在国内，我们的同龄人更加偏爱上山下乡的峥嵘岁月，而对“文革”往往语焉不详。但我们这代人是无法回避“文革”的。在开始做这个口述史时，我带着一个困惑，就是如何解释我们这代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所作所为。由于那一段经历，海内外对这代人众说纷纭。有人坚持“文革”前受的是“净化灵魂的教育”，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长大，“文革

《动荡的青春》

”的发生突如其来、莫名其妙。但若果真如此，该如何解释“文革”初期我们中间很多人凶神恶煞、伤天害理的行径？又有人说这代人从小就喝狼奶长大，只知道仇恨和阶级斗争，和“世界优秀文化”隔绝，成为“打砸抢”式的红卫兵顺理成章。但如果这代人生命的底色是黑暗的，从小灵魂就是扭曲的，又该如何解释他们在“新时期”伊始，即在各个领域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冲锋陷阵？这个“后劲儿”是从哪里来的？插队的经历固然使我们这代人意识到中国社会不变不行，早年的教育有没有起作用？对这代人成长过程截然不同的看法，体现出如何看待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困惑。正因为如此，认真的清理才更加必要。也许这件事应该从每一个人做起？集腋成裘，我们这代人中的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一部故事，大家的故事凑在一起，就编织成一幅斑斓的历史画面。从个人来讲，从头梳理是追溯自己生命的纹路；从宏观上讲，也许能反映出中国近几十年来翻天覆地变化内在的逻辑、矛盾、冲突和动力。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这部口述史，既是个人的，也可以看做是关于一代人成长过程的两个个案。我们无意也无法代表任何他人，但我们自觉地把自已看做这一代人中的两个成员。不同于很多同代人仅关注“文革”前后的做法，我们从幼时讲起，时间跨度30多年，涉及了若干历史阶段。这样做，是想从头看看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也试图对那个颇有争议的、关于我们这代人成长历程的问题梳理出自己的答案。

在叙述中，我们大量地涉及发生在家庭、学校、大院里的日常生活：少先队的队会干什么，一家人在周末去哪里，大院里是什么样的氛围；也回忆平时唱什么歌，读什么书，看什么电影，等等。这些生活的细节对我们绝非次要的点缀，而是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构成了我们生活的主要内容，培养和塑造了我们的志趣和性格。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相信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细节是有史料价值的，能为当时的社会和时代提供具体的、有质感的说明。我们是怎样长大成人的，当然要涉及我们所经历的政治运动，“文革”时期的政治冲突无疑是最富于戏剧性的，但看似平淡的日常生活对理解那个时代也是不可或缺的。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对应一般历史回忆中重视政治史，而轻视社会史、生活史的倾向；在西方出版的中国人写的回忆录中，这个倾向尤为明显。他们那样做从个人遭遇角度讲可以理解，但却无法涵盖丰富多面的大千世界，不符合大多数中国人复杂的历史经验，也容易落人本质主义和意识形态化的窠臼。

我们都是女性，成长在中国社会大力宣传男女平等的年代，又在性别意识敏感的美国生活了多年。在今天的中国，女性的形象和我们当年有天壤之别。如何看待我们那一代女性走过的道路，是个众说不一、见仁见智的话题，也是我们当初决定做这部口述史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带着“性别意识”的眼光，我们来审视自己作为女性成长的过程：怎么在十四五岁的“花季”、在不知不觉中脱下花裙子、穿上蓝布衣，成为“不爱红装爱武装”的一代；在爱情和婚姻的问题上，我们情感和经验的参照物是什么；作为“过来人”，我们对毛泽东时代的“妇女解放”怀着什么样的心情，等等。今天来探讨这些问题，不但对我们那一代人，也对当代中国年轻女性仍然有意义。

在我们的生活中，母亲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对这一点，叶维丽多年前即有所感悟，马笑冬则在近年来一点一滴地追寻回味。西方的妇女研究很注意母女之间在性别意识和角色上的传承。我们的母亲均已去世，她们那一代人也大抵离开了这个世界，但她们是我们最重要的人生教师，她们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延续。通过这部口述史，我们寄托对母亲深深的思念。

人，是一代一代繁衍的。我们成长史的叙述，从未曾谋面的祖辈开始。由于1949年以后片面的历史观，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自己的祖辈一无所知。在这里将他们的故事放在前面，有认祖归宗的意思，也想通过个人的家庭史，包括父母辈的革命史，沟通20世纪的中国历史，将自己这一辈的骨肉生命与前辈们的接续上。这样做，也算是一种反抗历史遗忘的姿态吧。说到“革命”，这个在我们年轻时使用率极高的词，在“告别革命”的今天，已不时髦。革命是否已经过时，还要拭目以待，但以往革命的“遗产”确实有待清理。这个任务，对我们两个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成长在“革命时代”的人来说，有着多重含义和一言难尽的感慨。清理的对象不仅是外部的意识形态及父母辈潜移默化的影响，还有在我们身上的烙印。

历史从来就不是“自然”和“纯客观”的。我们不是在“记录历史”，而是在今天的语境中，用新的眼光，带着新的问题，来重新审视自以为烂熟于胸的过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视野不断在开拓，我们的认识不断在深化，我们对自己更加了解。这个不断审视的过程，并没有因为我们口述史的结束而告终结，它使我们用一种开放的心态，不断地与过去对话，更加清醒地在今天生活。

我们两人中，马笑冬在拿到美国东北大学社会学的博士学位后，于1999年秋返回国内，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目前已退休；我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目前在美国马塞诸塞州州立大学波士顿分校任历史教员。本书材料一部分来自我们两人90年代中期的录音记录，一部分来自此后我们做的文字补充，以及我作为原始材料整理和贯通者所做的编辑、补充和润色。在每章前我都添加了简短的前言。原始录音是对话的形式，目前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对话的色彩，但大部分篇章

《动荡的青春》

都将两人的故事分开叙述。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每人的故事相对完整，而不致过于细碎。这本书已出英文版，内容和中文版大同小异，又有所不同，因为读者对象完全不一样。英文版的对象是不了解中国现代史，又受到“冷战思维”严重影响的西方人；中文版的对象是国人，特别是我们的同代人。

在做这个成长史的过程中，贯穿始终的是这样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身在海外，立足于今天，我们回首过去。它唤醒我们久违的童真的欢悦，也触及我们内心深处的伤痛。我们诉说着，倾听着，有时互相补充，有时互相质疑。两人的故事穿插进行，揭示不同角度的思考，表现不同看法的撞击。虽然从地域、家庭背景和生活经历而言，我们是“一块布上裁下来的” (cut from the same cloth)，这确实是我们这部成长史的局限所在，但一块布也能做出样式不同的衣服，同中有异，也许比完全不同更加有趣。

《动荡的青春》

内容概要

《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是一部两人口述的成长史。口述者带着重新审视历史、反思既往的目光，向读者展现了形形色色革命下的社会图景和青年人的激情与迷茫。因其摒弃非黑即白的刻板模式而生动感人，令读者感慨和深思。这部书对于“文革”及其前后中国历史和社会的研究，是难得的口述历史资料亦是研究成果。

《动荡的青春》

作者简介

叶维丽和马笑冬在1966年“文革”爆发时均为北京的中学生。1968年她们分别赴山西和云南插队。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二人先后赴美留学，并均获得博士学位。目前叶维丽在美国马塞诸塞州州立大学波士顿分校任教；马笑冬1999年回国，在复旦大学任教，现已退休。

《动荡的青春》

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剪不断

天津—北平—延安：叶维丽的家庭

“人总要知道自己是从哪儿来的”：马笑冬的家庭

第二章：“祖国的花朵”

“整托”

饭桌旁的家庭

“革命的贤妻良母”：马笑冬的回忆

“做女人，要争气”：叶维丽的回忆

马阿姨和仇大娘

大院

新华社大院

商业部宿舍大院

“平民学校”和“宝塔尖”

“困难时期”

政治阴影

第三章：从“公主”到红卫兵

“革命化运动”

“文化大革命”

“这么解放”

“死了就死了”

“破四旧”

文革中的家庭

大串联

“天桥打场子的”

第四章：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再次激起了我的热情”：马笑冬的经历

“我要有一个新的开始”

思茅

“两个世界”的交叉：叶维丽的经历

当农民不用政审

“吃了吗？”

“女儿，女人，老人”

“七尺灰”

无形的墙

“歌唱动荡的青春”

第五章：工农兵学员

“画皮”：叶维丽的大学生活

“新集体”——被削弱的神圣感——再次插队：马笑冬的大学生活

第六章：新时期

叶维丽：“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

马笑冬：催生“潘晓”

后语

第一章：剪不断 天津—北平——延安：叶维丽的家庭 叶：1998年我去了一趟延安，我爸爸妈妈40年代在那儿生活了六七年，从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就开始在新华社工作，一直到他们退休。我参观了在清凉山上的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的旧址和建在旧址旁的纪念馆。在纪念馆里我看到了一些我父母同事的照片。他们穿着灰布军装，都很年轻，才二三十岁吧？我和他们的孩子们从小一起长大。看着照片上我很熟悉的叫叔叔伯伯的人们，脑子里就浮现出他们孩子们的模样，心想儿子和老子长得可真像。这时我突然意识到，虽然我自己的父母没有在照片上，可这些人都是我的父辈啊。我们的身上带着他们的印记，血脉相连。通过他们，我们和当年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的那场革命有了骨血的联系。从纪念馆走出来，阳光高照。清凉山的对面就是宝塔山，而宝塔山一直是“革命圣地延安”的象征。这时从远处飘来哀怨的唢呐声，有一家人正按照传统方式出殡。60多年过去了，这场革命到底留下了些什么？我看着宝塔山发愣。这时候走过来一个算命的先生，他以为我这个中年妇女有什么心事想不开，问我要不要算一卦。现在上清凉山的人大都是去山顶的寺庙烧香拜佛的，很少有人来参观革命遗址。算命先生绝对想不到我是在发革命之幽思。马：我和你一样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革命情结。80年代我到美国之前在国内当记者。在我当记者的9年里，到延安，要去参观枣园和杨家岭；到重庆，要去看白公馆和渣滓洞；到南京，要在雨花台前静默一会儿。可是后来对共和国历史的反思，使我常常忍不住当着我的父辈们激烈地批评共产党，批评它在60年代初大饥荒和稍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对老百姓、包括对自己的同志欠下的一大笔债，以及改革开放后对治理腐败的无力和推进民主进程的缓慢。我的激烈多少使我的父辈们伤心，因为他们曾为平等和民主的理想奋斗过，为此他们付出了很多，他们希望自己的付出是有价值的。我理解他们，从心底想为中国革命发生的必然性、正当性找根据，想为我的父母和他们的同代人奋斗一生的价值作辩护。叶：我更多的不是想去辩护，而是想把那场革命放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中去理解。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段重要历史，它复杂的遗产总得由我们自己来清理。再说我也想知道当年“革命”对我父母这样的人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他们一个出身资本家家庭，一个出身地主家庭，会抛弃安逸的生活，去投身革命。我爸爸曾经给我讲过他小时候经历的两件事，我常想它们或许可以说明一点问题。我父亲家在天津，小时候常见到要饭的。有一天他和哥哥在他们家大门口外玩，走过来祖孙两个讨饭的人，说话带着浓重的外地口音，不知是什么地方闹灾荒背井离乡出来的。祖父低声下气地磕着头，没想到那个看来只有六七岁的小女孩却说：“甭磕头，磕响头他们也不给。”这句话，当年的那两个“小少爷”——我父亲和我七伯伯——都记住了，很多年后他们俩分别回忆起来，居然脱口就能一字不差地学女孩子的话，对她的骨气仍然赞叹不已。还有一次我爸爸在街上见到一个乞丐，他为了求得别人的怜悯，故意用砖头把自己砸得鲜血淋漓。后来我看书，知道这种乞丐叫“苦乞”，专门用伤害自己来求得别人的同情。要饭的女孩和苦乞让我父亲从小就感到社会的不公。这样的感受，我父母那一代很多“进步青年”都有过。比起那一代人，今天我们对社会底层贫病交加的人要冷漠得多，往往视而不见。每想到这一点，我就感到我们不如父辈。虽然我父亲家里很有钱，光佣人就雇着二十几个，可其实在家里就有很不公平的事情。我爷爷在清末是个中等官僚，做过直隶的“巡警道”，就是当时的省警察厅长。中国原来没有警察，“巡警道”是清末“新政”搞改革的产物。民国以后他弃官从商。当时弃官从商搞实业，在南方最有名的是清末状元张謇，在北方是周学熙。我爷爷属于周学熙这个圈子。周家，就是周一良他们家，和我们家是安徽同乡。有篇文章，讲安徽人在近代对天津的贡献，我爷爷也应包括在内吧。他在银行做总经理，还在几家现代化的产业中兼着职，其中包括担任启新洋灰公司（在唐山，曾是全国首屈一指的水泥厂）的常务董事。我想我爷爷应该算是一个从旧式官僚转化成新式资产阶级的典型吧。我爷爷虽然成了“资产阶级”，可是家里的生活方式，用我一个伯父的话说，还是“封建主义的”。家里最年长的是我爷爷的母亲，我的祖奶奶。她的地位至高无上，有点儿像“红楼梦”里的“贾母”。我爷爷是孝子，给祖奶奶过70岁生日的时候，光是一出堂会花的银元如流水，从北京请余叔岩、杨小楼等名角来唱戏。我爷爷有三位夫人，大太太没子女，孩子们都是姨太太生的。我自己的奶奶是二姨太，据说在三位夫人中她最受我爷爷的宠爱。我爷爷下班回家后，常躺在一张藤椅上，让我奶奶给他读鸳鸯蝴蝶派小说作为消遣，可见我奶奶是识字的。他们俩读小说的情景让我觉得有点儿滑稽。据说我爷爷和大太太的关系并不好，连话都不怎么说。可是这个家却是由大太太掌管的，因为她是明媒正娶的太太。家里在称呼上有严格的规矩，孩子们管大太太叫“妈”，管他们自己的母亲叫“姨”。两个姨太太的地位比家里的佣人高不了多少，大太太对她们任意欺压，不合意的时

《动荡的青春》

候还要骂上几句。她们得给大太太梳头捶腿，铺床叠被，直到她们的儿子大了一些，母以子贵，才不用那么做了。姨太太们吃饭不能跟老爷太太在一张桌子上，甚至也不能跟她们自己年龄稍长的儿子们在一起，得和幼小的孩子们一起吃，两边的伙食是不一样的。说起来，就是当“主子”的，也分三六九等。

我奶奶在去世前的弥留之际，为了能够在死后穿红裙子，在病床上哀求大太太恩准——这时我爷爷已经过世。大太太同意了以后，我奶奶挣扎着起来给她磕头，说：“谢谢太太。”第二天我奶奶就死了。穿红裙子是地位的象征，正室夫人才能穿。我奶奶对死后的装裹如此看重，是为了在“来世”争得一点尊严吧？她的丧事办得很简单，埋在我爷爷的坟稍后的位置，仍然居妾位。后来和爷爷合葬的是大太太。

三位夫人中最后去世的是“大姨太”，那已经是60年代了。她说她绝不愿意和“叶家人”葬在一起。这位奶奶身世非常苦，她是河南农村的孩子，黄河泛滥时她家把她放在一只木盆里，任其漂流，被救上来后卖给了一个官宦人家做丫鬟，后来又被这家当“礼品”送给我爷爷。成亲的时候她只有十四五岁，当天晚上吓得钻到方桌底下不敢出来。

可惜的是我对自己奶奶的身世，除了知道她是唱戏的，别的就都不知道了。听一位长辈说，她是唱京剧须生的。艺人的社会地位低下，尤其是女艺人，可见奶奶的家境一定很寒微。她的兄弟来看她时，只能跟她在门房会面。我父亲他们从来没有称呼过自己的舅舅，也没有见过母亲其他的“娘家人”。我见过爷爷和奶奶的照片，爷爷显得很威严，正襟危坐，一派“老爷”模样；奶奶长得很端庄，没有脂粉气。听说大太太只许两个姨太太穿质料和式样一模一样的衣服，我奶奶的“时髦”表现在她脚上穿的黑皮鞋上，这大概是大太太管不了的。这个细节让我对奶奶更加好奇。现在没有一家亲戚保留有爷爷奶奶的照片了，可见“文革”中销毁照片的不只我们一家，但是我至今仍然记得照片上爷爷奶奶的面孔，这就是血缘的力量吧。

由于母亲们在家中的地位，我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们虽然是少爷小姐，也感受到了压抑和不平等。我的一位伯父，在老年时说起我奶奶临终前的哀求，仍止不住痛哭失声。后来我父亲的兄弟中有三个人在“红军时期”（1937年“七七事变”前）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我的一个伯父说，像他们这样的富裕家庭，会冒出这么多跟着共产党走的孩子，是和他们母亲们的境遇大有关系的。

我父亲和他的兄弟们政治上左倾，也和他们后来的教育经历有关系。他们都是上的南开中学。南开当年是天津最好的学校，办得很有特色，真正的德智体全面发展。我爷爷是个新旧参半的人物，他让儿子们受的教育也是中西结合。小时候让他们在家里读私塾，到了上中学的年龄才出去上学。我爷爷希望儿子们将来搞科学技术，当工程师。他经营的工厂里技术人员是德国人，他希望儿子们能取代这些外国人。我几个伯伯中学毕业后上的不是清华就是燕京。我爷爷死得早，他不会想到后来他只有一个儿子从事科学研究（我七伯伯叶笃正，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他的儿子日后生涯都多少和政治沾了边儿，其中有两个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

现在回头看，南开对我父亲他们后来走的道路影响非常大。我的一个伯伯说，上南开前他只知道有家，上了南开才知道有国。而那个时候，中国已经国将不国了。我爸爸上中学的时候，日本人已经占了东三省，正在一步步向华北进逼。南开中学离日本兵营很近，在课堂里就能听见日本人演习打炮的动静。用当时的话讲，真是“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很多青年学生都认为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对日本人太软弱，只顾打内战消灭共产党，是个腐败无能的政府。我爸爸在南开开始接触左倾学生，看左翼书籍，有一次在电车上看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还被宪兵盯上了，被抓进宪兵队，保释后才放出来。“一二九运动”波及天津，他也参加了。后来他到北平（今北京）上大学，又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跟着共产党抗战，我想这对他是个自然的选择。很多知识青年都是在那个时候参加的共产党。

共产党里管抗战初期参加中共的一代人叫“三八式”，我母亲也是这代人。对我妈妈的家庭我知道的太少了，到我想知道的时候，我妈妈因为老年痴呆症已经糊涂，没法告诉我了。

马：咱们都有这个遗憾，到咱们想知道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叶：真是遗憾。我妈妈家乡在河北蓟县，现在属天津管辖。我隐约知道她的祖上是跟着清朝入关的旗人，在京东一带跑马圈地，占了不少出产水果的山林。她的家庭在当地应该算个大地主了。我妈妈提起“老家”总是充满感情，常跟我们讲过过年时在老家吃什么，穿什么，我对中国民间习俗有一点儿温馨的感觉是妈妈给的。直到现在大年初一我一定得穿红衣服，因为这是从小过年妈妈就让穿的。我妈妈从来没跟我们讲过阶级剥削什么的，弄得我没有“阶级观念”，上小学时写作文还把我姥爷写成劳动模范。我小时候姥爷还活着，和我三舅住在一起，我只记得他穿着长棉袍，不爱说话。他是我唯一见过的祖辈。

我妈妈很小就离开家乡去城里念书，先是在蓟县县城读小学，后来又到北京读中学。我姥姥做主让家里的女孩子出去念书。我小时候常听我妈妈说起我姥姥，总说她“开明”。我姥姥信佛，心地善良，爱帮助别人。她去世的时候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大舅二舅都已经死在日本人手里了，我三舅和我母亲不在家乡，当地很多老百

《动荡的青春》

姓主动来给她出殡。这又不符合后来的阶级分析思路了。让女孩子受教育，这在当时即使不算惊世骇俗，也是需要胆魄的。你看我爷爷，虽然他给儿子们提供了最好的教育，可是不让我的姑姑们出去读书，只给她们在家里请人教识字和绣花，读的是《女儿经》，学的是“三从四德”。我姑姑们小的时候爷爷还强迫她们裹脚、梳辫子，那时已经是20世纪20年代了。我三姑最有反抗精神，她当着父母的面把辫子剪掉，然后放足。天津是个西化的大城市，我爷爷是个“资产阶级”，可是在女儿教育的问题上还这么守旧，就更显出我姥姥有见识了。其实要是看我姥姥的照片，她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北方农村老太太，自己也裹着小脚。我妈妈却没有缠足，而那个时候在河北农村缠足还十分普遍。有意思的是我姥爷由着我姥姥在这些事情上做主。我妈妈在北平上学的这一段我知道得很少，只知道她上的女二中很难考取。“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次我妈妈跟我说，如果不是因为抗战她会去学医。当时我正在农村插队，把这话理解成我妈妈希望我能继续上学，学得一技之长。后来我再琢磨，就想妈妈是遗憾她没去学医吗？她对自己一生走的道路到底怎么看？可惜我永远无法知道了。我妈妈在北平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据说表现得很勇敢，还挨了军警的刀砍。之后她也参加了“民先”。“七七事变”爆发后，我妈妈对和她一起在北平念书的侄女说：“你去结婚，我去抗战。”这倒很像我妈妈的语言，简洁、明快。我妈妈这个侄女是我大舅的女儿，年龄比我妈妈还大一点儿。她管我妈妈叫“老姑”，我管她叫“大表姐”。大表姐后来果然去结婚，嫁给了一个国民党军官，1949年去了台湾。我80年代在美国见到她的时候，她看起来至少比我妈妈年轻十几岁，保养得很好，给我看她们一家人去欧洲旅游的照片。提起当年，她说：“老姑是优秀青年。”结果我妈妈这个“优秀青年”在抗战中几乎把身体毁掉，瘸了一条腿，成了“残废”。比较我妈妈和大表姐不同的人生道路，我有说不清楚的感慨。马：你妈妈在战场上负伤了？叶：不是，是因为生孩子。我过去确实对人说过我妈妈腿瘸是因为打仗，觉得说“生孩子”不那么光彩。现在我开始明白女人在战争中有多么不易。

我大姐姐出生在1941年初，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当时我爸爸妈妈在山西晋西北兴县的抗战学院工作。我妈妈快临产的时候，正赶上日本鬼子最残酷的大扫荡。后来我看到一个材料，说那次扫荡光在兴县县城日本人就杀死了1000多人，牲口损失、房屋烧毁无数。我妈妈不能留在兴县，得撤到后方去。所谓后方，就是和兴县隔着一道黄河的陕西神木，那边就是陕甘宁边区了，有贺龙120师的部队。我爸爸不可能陪着老婆去生孩子，他得留下来参加反扫荡。我妈妈带着九个月的身孕，一个人上路。

40多天后反扫荡结束，我爸爸过黄河去找我妈妈。当时他心里就有不好的预感。见到我妈时，她躺在一间窑洞的凉炕上，数九严寒，炕洞都结了冰。人还活着，但神志已经不清醒了，说着胡话。因为严重的产褥热，她已经连续发了很多天高烧，头发上的虱子都结成了蛋蛋。我姐姐人瘦得像只小猫，没有母奶，就喝老乡送来的用黑豆磨成的豆浆，我爸爸到了以后没过几天她就死了。我姐姐叫“黑豆”，这名字是出生以前就取好的，因为我妈妈怀孕的时候吃了很多黑豆。光吃黑豆不消化，总放屁。我在山西插过队，知道黑豆是喂牲口的，人不吃。

《动荡的青春》

编辑推荐

史景迁[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 这本书以两个生长于毛泽东时代红色大院女性对话的方式展现一段历史。这段历史中的“文化大革命”成为作者叶维丽（及合作者马笑冬）“长大成人”过程中的重要历练。此书视角新颖，内容十分吸引人，具有别具一格的原创性。 吴思[著名历史学家、《炎黄春秋》杂志常务社长、总编辑] 我和作者大体算是一代人。这是一本帮助我们这代人了解自己的书。作者“我是谁”的追问也引发了我的反躬自问，我的答案也在作者的启发下浮现。真实的答案，隐藏在我们成毁变迁的轨迹之中。 柯文[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此书与先期出版的关于毛时代的回忆录的一个重要的不同，在于它与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有了一段更长的时间距离。时间以及空间的距离使本书作者得以进行不同与其他作者的反思，提出他们当时没有提出来的问题。这样所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本非常坦诚、深入探究问题的、十分有见地的作品。 印红标[红卫兵研究学者，北京大学副教授] 这是两位女性“老三届”人的口述历史。口述者带着重新审视历史、反思既往的目光，向读者展现了形形色色革命下的社会图景和青年人的激情与迷茫。因其摒弃非黑即白的刻板模式而生动感人，令读者感慨和深思。这部书对于“文革”及其前后中国历史和社会的研究，是难得的口述历史资料亦是研究成果。

《动荡的青春》

精彩短评

- 1、 文革的回忆，一代人的思考。
- 2、 历史学家自己回忆的口述史
- 3、 内容很一般，没有特色。所配图片大多是当时的公开图片。
- 4、 社会生活、社会事件等等社会史，是了解过去的一扇窗户，透过此可以看到生动鲜活的社会人生！
- 5、 着眼点仅仅是两个大院，显然不具备代表性。文革初期作者显然因家庭受到了冲击，但给我的感觉是她们在文革后期由于父母的复出，又是得益者。看过一些文革过来人的作品，感觉此二人写得是不疼不痒的。我不会推荐此书给打算了解文革的年轻人。
- 6、 了解到那个时代的女人
- 7、 花了3天时间就读完了，一本平民口述史，对于了解文革早期的学生心态有帮助，写得比较坦诚，但总体而言还是有些浅，似乎还有些不过瘾。
- 8、 服务非常及时
- 9、 作者主要写的是新华社大院，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相对来讲，文革中受的冲击还不算大。所描述的事情也很一般，不具有代表性。
- 10、 history book
- 11、 非常精彩的回忆录，尤其是关于北京大院文化和红卫兵运动关系的部分。
- 12、 《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用作者自身经历叙述了文革疯狂时期的社会现实，文笔流畅平实，事件真实，可以给人们提供一个历史旁证。我本人也是因为这些，才购买了它。对于历史长河中的纷繁复杂现实，它却只是一个点，只是两个特定家庭，一个新华社诸多子女中的两位佼佼者的纪实。这就是说，对于需要的人，它是有价值的，对于一般人，即使是研究文革史的人，也未必是很必要的，因为他们的经历并非典型。
- 13、 亮堂，真实，硬气，亲切
- 14、 期待已久的以生活史为主体，以女性主义视角审视红色文化的书。其中作者提到的大院文化让我有倾心赞同的感受。
- 15、 清醒才能理性，理性才能冷静。此书采用口述方式回顾当年，没有谩骂，没有恭维，没有怨天尤人。同龄人值得一看。
- 16、 I251/776
- 17、 这是一个把我拉回到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的书。文笔自然亲切，分析独到准确。一个人的命运总是被时代潮流所左右。一个时代的潮流又是由具体的人的命运所组成。因此，从一个人的命运，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变迁。这本书是两个人命运的纪实，也是一个时代的写照。那是一个把美丽少女变成凶残野兽的时代。那是一个用巧妙的办法把人才毁灭的年代——先加虚火，让他膨胀；然后，突然撤火，让他夹生。一批接一批的人就这样毁掉了。那个时代过去了！我们庆幸！为了它不再来，我们回忆。
- 18、 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好好非常好非常好！
- 19、 挺好的一本口述回忆录，主角是两个女性：叶维丽，马笑冬。她们可能不是特别有代表性，算是比较优秀的两个人吧，后来她们都成了女博士。她们的讲述挺真实的，有自己的思想变化，还有生活中经历的大小事，看完之后会对那个年代的偏见少了一些，真的不是一味的黑暗年代。
- 20、 作者可恶，用名字吸引人，买错了。
- 21、 推荐年轻人看
- 22、 对那段历史做个了解。
- 23、 应该值得参看
- 24、 有理性的面和动人的点
- 25、 没劲透了
- 26、 一边儿哭一边儿看
- 27、 用对话做文章，很能揣摩当事人的心理
- 28、 很有意思。
- 29、 蠢的够呛。

《动荡的青春》

30、叶维丽在《八九点钟的太阳》里讲述过。

31、可以了解一段很特殊的历史

32、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f066200100bvpv.html

33、很好看的一本书，给父亲回忆用的

34、很有意思的一本书，很多描写文革时期的书都是从历史政治角度；有从生活角度写的也大都是小说，经历上有失真，要么太过夸张，要么就是过于全面。这本书写得很实在，我最喜欢你面讲文革时期人与人之间的故事，很好玩。

35、如果你想了解中国当代的一些情况，就一定要看这本书！昨晚12点多，看完了这本书，用了一天半。震撼！我不大愿意写书评，一是文字功夫不行，二是见识浅薄，但看过此书，总有不吐不快之感。叶维丽和马笑冬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人物，她们的经历可谓坎坷（捎带提一句我是60年代末的人，没有她们的经历，9岁上的小学，后来问妈妈为什么那么晚，妈说：怕年龄小下乡插队受不了那苦）。我们的近代史、现代史、尤其当代史，官方的教科书，有学者称为“伪历史”，深以为然。个人的回忆录等才有可能是真的历史！正如书中前言讲“我相信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细节是有史料价值的”。她们讲述了父母、小学、中学（红卫兵）、下乡、上大学、留美。“潘晓”的讨论原来是马笑冬发起的，仅此一点，就让我敬佩不已。谈到红卫兵打人，想起巴金的锥心之问（大意），那些人究竟是怎么教育出来的？不是一直教育又红又专吗，打死卞仲耘校长，怎么就能下得了手？马笑冬敢于承认自己打过人，更让人敬慕。好多过来人，大多在控诉自己是时代的受害者，可想过自己有什么过错吗？上帝的责任给上帝，我的责任我来担当。看到作者叶维丽的舅舅白景扬的传统文人风骨时，心中不禁肃然起敬。好在中国还有一些脊梁，尽管很少，但那也是希望。否则，这个民族就真的无可救药了。经常听说，好多知青后来又回到当年插队的地方，还有青春无悔的说法（好像姜昆讲过），无悔为啥都要返城呢？书中谈到，“我们回村寻找的，是自己逝去的青春。我们并不真正关心在那块土地上生活的农民和他们的命运。说到底，还是两个世界。”书中最后提到，马笑冬有重病，已不可逆转，没有讲什么病。在网上查到是严重抑郁症，已无法认人，无法站立了（2011年7月的文章），真让人痛心。她的病和她的经历有关吧，真心祝她能够安康，安宁！！出生于五十年代的，有人写回忆性的文章，六十年代还很少见，希望能早日见到。另外已写的作者都是干部子弟（包括本书的），平头百姓的我没见过，同样希望能看到！再一次强烈推荐，真的是一本好书——《动荡的青春》！

36、动荡的青春，叶维丽等，新华出版社2008。0322在孔夫子想买一本纸书，当天上的货（显示库存8本），卖家说实体店买完没货，取消了订单。无奈，其他的卖的太贵，就先不买纸书了。找别的书的时候找到pdg格式的这本书，后找了一个软件转化成pdf格式的（有一个网站的捆绑软件太多，电脑差点死翘翘）。在读电子版20170323-0327简单翻翻，主要对师大女附中那段感兴趣，卞仲耘、818宋彬彬等。值得买一本留着的书，有机会时买一本吧。

37、重新了解自己，就得从了解祖父辈开始

38、活动的时候买的，用来屯，还是很划算的，还没看，所以不知道内容怎么样。整体看来还是不错的。而且想通过那个时代的人，来激励自己。

39、看了一点，语言流畅，那个年代在部队大院的青年一代，他们的经历都挺传奇。和老百姓的生活不太一样。

1、（已发表于2014年第56期《领导者》杂志，谢绝转载。）几乎所有与文革有关的影视文学作品，都绕不开大字报、红宝书、批斗“牛鬼蛇神”等典型元素，但姜文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却将之一概摒弃。明明是拍摄十年动乱，导演回忆的，却是捉弄老师、追女孩儿、偷看内部色情电影等个人体验。而且这一切，全由明亮到几乎都曝光过度的镜头来呈现。这种南辕北辙的荒诞感，在电影刚开始的旁白中便很明显：“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伴随着我，阳光充足，太亮了，使我眼前一阵阵发黑……”如此颠覆性的文革叙述，却绝非编剧王朔和导演姜文的凭空捏造。在文革的某一个特定时期，京城里确实有一批年轻人，过着与电影中的马小军和那帮“坏孩子”们类似的生活。他们主要是当时北京地区的大院干部子弟，尤其是军队干部子弟。但他们的特殊经历，却被充满了血泪与控诉的主流文革话语给掩盖了。和姜文的电影类似，叶维丽、马笑冬的对谈录《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也是从亲历者的视角，还原大院干部子弟的文革岁月，在很多方面，和电影可以相互印证。“大院”是49年后才在大陆出现的一种全新居住形态，其共同特征是封闭、自成一体，“体现了共产党对日常生活的一种改造”。它最早起源于延安，解放后被带入全国各城市。大院对成年人而言，几乎就是边沁（J. Bentham）式的“圆形敞观监狱”（Panopticon）：即使回到家，同事间仍处于相互监督之下，稍有不慎，便可能成为别人的把柄。但孩子们的大院则是乐园：他们从小在院里成帮结伙，“呼啸而过，打打杀杀，有玩不完的游戏”，红卫兵运动爆发后，他们就自然结成了最团结、战斗力最强的派系。所以叶维丽认为：“要研究文革早期的红卫兵运动绝不应该忽略大院，红卫兵的中坚就是大院的孩子。”通常只有中下层干部及其家属住在大院里，“真正的高级干部是不住大院的，他们住胡同里的独门独院”。但同时，大院居民又比胡同里的“老北京”高出一等，能享受到后者所享受不到的图书馆、食堂、医院等公共服务，以及高人一等的物资配给。尤其在三年饥荒时期，口粮配给上的差异显得更加明显。马笑冬回忆道，60年她曾在街上遇到饥民索要她手中面饼吃，吓得心怦怦直跳：“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讨饭，觉得这种事不该发生在我们的社会。”新华社大院的叶维丽从小“看到的世界，就只有光明”，直到升入小学后，这种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由于同年级里高官子弟云集，学校的孩子们“对家长的地位和级别特别敏感”，连“什么级别的人坐什么车”都一清二楚。在这样的环境下，叶维丽开始有了自卑感：开家长会时，看到别人坐小汽车，前呼后拥而来的家长，再看看自己只能步行来开会的父亲，她不禁从心里感叹道：“我真希望他也能坐车来”。建国之后，不论是用独院、大院和胡同三种居住形态划分居民，还是用悬殊的工资、待遇等级差别将干部分成三六九等，既是中国官本位传统的渣滓，又是革命斗争的遗产——“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理想虽崇高，但在实行过程中，却只有严格规定上下尊卑，才能保证命令逐层向下严格贯彻，使整个组织高效运作；细密的等级划分，又能使干部对于自己付出和回报的关系更为敏感，最大限度地激发其工作热情。64年前，社会等级制虽然确实地存在，但尚无人敢挑战“人人平等”和“劳动最光荣”的观念。所以就连高级干部对自家的保姆，都必须以“同志”互称，非常忌讳盛气凌人。但自从1964年6月“培养接班人”的问题被提出来开始，“家庭出身”开始赤裸裸地凸显。从64年到66年的“前文革时期”里，“革命干部子弟”成了最优越的出身。马笑冬说：“就是那个时候，我开始有了自己是‘革命干部子弟’的意识”，有了一种“优越感”。原本自卑的叶维丽，也开始喜悦地发现：“做‘人上人’毕竟是一种不坏的感觉”。同时，“大讲出身的结果就是圈子越划越小，干部子弟内部又无形中分普通干部子弟和高级干部子弟。”社会的裂缝，已经无法再掩饰了。正如康德（I. Kant）所说，一个社会存有某些道德的假象，总比连假象都没有好，因为虚伪的存在，说明强者对弱者至少还有所顾忌：“这种德行的假象，也许最后会真的一步步唤醒德行”，所以虚伪其实“不是欺骗，而是我们自身中的无害的幻觉。”一个虚伪的社会往往不至于太坏，什么时候连虚伪都消失了，才是真正可怕的时候——64年后，对于阶级性的过分强调，使得公孙龙“白马非马”式的悖论深入人心：“地富反坏右”的属性可以使一个人自动丧失其为“人”的地位，所以“不但可以见死不救，而且打死也是死有余辜”。要理解文革初期官方文件和各类政策的自相矛盾与前后抵牾，必须认识到：毛泽东在文革初期虽然是全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绝对权威，但在政治上却还处于“退居二线”的状态，真正主持工作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所以，1966年5月16日标志着文革爆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虽是毛泽东的旨意，但政策的具体执行却不是他所能控制的。从那天起到7月29日，是文化大革命中气氛最诡异、各方角力最激烈的“工作组”时期。工作组时期，务实派刘邓延续了之前“反右”“四清”等政治运动的惯例，由党委派工作组进校，“好好控制运动，维持好局面”。不但没

《动荡的青春》

有实施《五一六通知》中提出的批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要求，反而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原本的官僚等级制。此时“并没有太多青少年‘自发’表现的空间，因为工作组强调‘文革’要在他们统一领导下按部就班的进行”。叶维丽回忆道：“工作组时期我们每个班都有一个‘文革’领导小组，负责人差不多都是班里父亲官儿最大的，这种倾向在年级负责人里更加明显”。此时，住独院的高干子弟当仁不让地成了运动的领导者，住大院中的中下层干部子弟则暂时靠边站：“文革一开始，就是看谁家官大，谁大，谁就是人物。这一点就让我觉得，这不是我的运动，是她们（高干）子弟的运动。”但这种情况没有延续多久。7月18号，毛泽东忽然从南方返回北京，6天后决定撤销工作组，29号，中共中央便在人民大会堂宣布了这个决定。解散工作组是毛泽东夺取文革绝对领导权，使“政统”与“道统”在他身上合一的第一步。深谙权术的毛，同时又巧妙地保留了“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刘、邓二人的职务，避免了给人留下过于咄咄逼人的映象。这种柔性手腕效果很明显：在29号撤销工作组的会议上，刘少奇公开承认错误：“文革怎么搞，说老实话，我们也不晓得。”不急于攻城略地，而更注重摧毁敌人的“有生力量”，毛在文革初期的党内路线斗争中延续了自己军事思想的精髓。从7月24号到8月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颁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条》）这段时间，可称为文革的“再发动时期”。这段时期，原本受“工作组”压制的造反派得到了解放，“一大批原来不知名的青少年登上了历史舞台”。若仔细分析《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这两份文革初期的纲领性文件，便可看出情况已发生多大的变化。《五一六通知》总显得底气不足，欲言又止：“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文化革命的路线问题”，“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但到了《十六条》时，语气便已斩钉截铁：“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更是迅速把运动推向全国。叶维丽对文革“再发动时期”的感觉是：“8月上、中旬一切都是乱糟糟的，形势变化极快，‘一天等于二十年’，有时上午、下午的形势都不一样。也就是在这段时期，红卫兵运动一轰而起。”上层政治风云突变，下层红卫兵运动也在激烈震荡。就在7月29日解散工作组当天，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的干部子女便贴出了著名的“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的横空出世非常耐人寻味，它诞生与毛泽东重新掌握中央权力之时，但却没有证据表明这是毛泽东的思想。此时干部子弟的处境，非常像南朝的门阀士族：唐长孺在研究公元5世纪南朝宋、齐时门阀制度时发现，正是在传统门阀士族地位下降，寒门地主地位上升之时，高门士族们“不得不深沟高垒，严加堤防”，创造出“清流”、“浊流”这两个概念，把自己和新贵们分别开来，“以自己的权益，阻断寒门上升的途径，企图表明法令认可甚至皇权直接干预也不能代替和逾越士庶区别的传统界限。”同理，对于政治风向极为敏感的干部子弟也正是在地位受到威胁时，才悍然抛出“血统论”来抵抗红卫兵运动正向底层蔓延的趋势。这一做法达到了不错的效果：从66年8月8日到当年年底，可称为“干部子弟领导期”。这一时期的红卫兵运动，主要以学校为单位组织，干部子弟由于其高贵的出身、对政治动态的了解，以及身为“革命接班人”的自信，使他们成了运动当之无愧的“宝塔尖”。虽然这一时期遇罗克的“出身论”也造成了很大影响，但根本上无法动摇“血统论”的霸权地位。干部子弟们最恐惧的，就是他们的父母一夜之间也被打倒，成了专政对象。因为这会使得他们自动跌出革命接班人的行列，堕落为“非红五类”——原本荫蔽他们、带给他们自豪感的“血统论”，马上露出“以理杀人”的狰狞另一面。尤其在大院里，这个“有点儿什么事能传得人人都知道”的居住空间里，世态炎凉表现得更加残酷：叶维丽的父亲被打为“反革命、黑帮后”，她马上感觉到“周围的人都在指指点点地说我”，“街道上的小孩就欺负我妹妹，吐口水啐她，扔石头打她，那时候她才六七岁。”而随着包括刘、邓在内的一大批中高级干部相继被打倒，终于“到了1966年底，老红卫兵衰败了，红卫兵组织变得五花八门，什么人都能参加，是不是红卫兵不足以区分人了。”革命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到了这个地步，在各自学校丧失领导地位的大院子弟们不得不重新组织，化零为整，“开始越来越多地在一起活动”，“这样的群体活动多少减轻了家长出事对孩子们带来的冲击，使日子好过一些。”大院文化在这一时期开始走上街头。电影《阳光》中马小军的那帮大院“坏孩子”们，本来被分在不同的中学，大致就在这一时期重新组织：“本来分开的好哥们儿，又相聚了。”必须注意的是，文革时被打倒的，多是行政干部；但由于中央“军队不能乱”的指示，军队干部并没有受到太大冲击。所以“这时候大院文化应该主要以部队大院为主，因为地方干部子弟的家庭差不多都出事了，他们不太‘狂’得起来。部队干部受的冲击小，他们的子弟‘气’仍然比较‘盛’。”大院干部子弟红卫兵从小生活在一起，本来就比分散居住的平民子弟红卫兵团结得多。除此之外，

《动荡的青春》

在59至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也就是青少年发育期时，干部子弟有相对充足的食物供应，甚至肉、蛋等“奢侈品”，这就使得他们普遍比平民子弟高大强壮。更为重要的是，干部子弟与官方、军队毕竟有着密切联系，他们可以得到更为精良的武器装备，信息渠道也更为畅通——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正是这些因素，在文革后期长期维持干部子弟之地位于不坠。姜文电影中的一个场景——卢沟桥铁轨下的未遂武斗——反映了这一点：敌方的平民子弟红卫兵虽黑压压一片，却看上去气势不振，清一色的灰蓝工装、木棍和国产自行车，基本为冷兵器时代的低级配备；马小军在内的军队干部子弟，却人高马大，穿着象征身份的军绿色上衣，手持钢叉、匕首、原版和改装过的霰弹枪等武器，甚至有车牌号为7-2866和7-2867的两辆军用卡车。不难想象，若真的开打，精锐且骁勇善战的军队大院干部子弟，无疑会给平民子弟红卫兵造成极大的杀伤。从66年底到68年底，可称为“后干部子弟领导期”。老红卫兵的衰落，几乎是必然的，因为毛发动文革的本意，便是推翻已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官僚阶级，借助青年学生的新鲜血液，恢复党内已被腐蚀的革命传统。这一任务，怎么可能由官僚阶级的下一代来完成呢？但在66年夏，大部分人对于文革还将信将疑之时，暂时先起用态度最积极的干部子弟，乃是一种权宜之计。待到全国革命青年都被发动起来之时，便可弃“老红卫兵”如刍狗了。于是在66年冬，干部子弟们“终于发现，革命不再不再是他们的特权，而且他们的家庭也成了革命的对象”，“他们中间有些人产生了很强烈的被利用的感觉。”他们成了“逍遥派”，或者“天桥打场子的”：“老红卫兵在文革初期为文革造了声势，现在‘场子’打出来了，他们也没用了。”就是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联动”等反文革组织开始出现，“很多老红卫兵从运动初期的宠儿变成了反对派，公开和中央文革捣乱”，质疑文革的正当性。文革的第一批幻灭者、清醒者、反行为者，就这么在北京出现。没有了父母的管教，失去了革命的冲动，“从极端革命到颓废堕落也挺自然。”老红卫兵们此后过着一种波西米亚式的生活：偷窃、读禁书、弹吉他唱歌、四处游荡；男孩披上父辈华丽的将校呢制服，女孩则穿起不久前他们“破四旧”时抄来的欧式白纱裙；北京最高档的西餐厅“老莫”，成了他们最钟爱的聚会场所；“拍婆子”在马小军、米兰、刘忆苦、余北蓓们之间盛行，禁欲主义已被完全抛弃——“18岁是和青春、和性成熟联系在一起”，这既解放又禁锢，既反叛又保守，既“阳光灿烂”又“一阵阵发黑”的岁月，直到68年冬上山下乡运动全面开始后，才终于戛然而止了。2013-10-7初

稿2013-10-13定稿

2、回忆总是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记忆的屏幕上留下的只是你愿意留下的场景，而屏蔽了那些不堪回首的内容。所以同样是“上山下乡”，在成功者眼里是“青春无悔”，而对于失意者来说则是绵绵不绝的怨怼。事情的真相需要拉开一段距离才能比较客观地呈现。最近我读了《炎黄春秋》杂志介绍的回忆录《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作者叶维丽和马笑冬都是北京的老三届，后在山西和云南插队，80年代先后赴美留学，均获得博士学位。目前叶维丽在美国大学任教，马笑冬回国在复旦大学教书，现已退休。从一般意义上说，她俩也属“成功者”了，可是她们的回忆没有丝毫的骄矜之气，而是力图跳出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意识形态的羁绊，对这段人生进行了尽可能全面的疏理。我虽然不是“老三届”，但和她俩的历程有许多重叠处，所以读来非常亲切，时时会掩卷而思。解放以后，左的思潮渐渐成为主流，可是在57年“反右”以前，学校毕竟还是对我们进行了人文教育。老师们有些是从旧社会“遗留”的知识分子，有着一份诚实和执着；而青年教师则热情、活跃，总之都是些热爱生活、热爱新社会、好学上进的理想主义者。而当时对文艺的钳制也远没有后来那么严厉，只要愿意，你可以看到许多古典的、欧美的文艺作品。那时功课不多，我几乎看遍了图书馆里的欧美小说，直到现在，还时时从记忆里蹦出来。至于外国电影，当时下午第二场票价七折，一毛四（二轮影院），我更是省下早餐钱，每片必看。所以我们一代是接受过比较系统的人文教育的。小资情调的渗透，肯定有许多负面影响，但是它们对于我的积极意义似乎更大。比如在最困顿的时候会有某种信念在支撑，让自己捱过“精神危机”。比如学习和思考形成习惯，终身不改；更重要的是尽管后来变得世故，会耍小滑头，使小聪明，说言不由衷的话，做会脸红的事，但毕竟头顶悬着让我敬畏的“良心”和“人格”，守住了道德的最底线，没有谄媚，也没有告密，没有不择手段去换取一勺残羹。叶维丽回忆自己下乡后，远离了政治中心，在一定程度上有了自由，她们传阅大仲马、司汤达，唱拉美情歌，偷听美国之音和BBC，莫斯科电台播的《山楂树》使她们恍如仙乐，而一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唤醒了她们童年善良和美好回忆，抚摸了因为“文革”变得粗粝的心灵，激起了她们心中的温情和伤感。她们哭了，我也泪水涟涟——专制也好，暴政也好，人文传统是会一脉相承的，美好的人性是消灭不了的！“上山下乡”使一群城市“细伢子”真正认识了生活。首先是难以想象的贫穷。有一次，马笑冬看见一个男人从山上背下个老太太，惊呆了：瘦得像个鬼，像是在骷髅外包了层皮；男子

《动荡的青春》

说是背母亲去山下看病的。叶维丽一次去聊天，一个三岁的女孩不时到窗边去一下，原来窗台上放着一块水果糖，连糖纸都没有，大概是从供销社买的，她过去舔一舔，放回窗台，过一会儿再去舔一下。这个女孩轻轻舔糖的动作使她终身难忘：是孩子惊人的自制力，更是中国农村的穷！“解放”究竟给农民带来了什么，她沉思了。与官方灌输的不一样的还有农民的“思想觉悟”。在村里，偷是普遍现象，偷集体，偷懒。不是“觉悟高”，不是“品质优秀”吗？不是要向他们学习吗？……原来这都是谎言！我觉得，一个人有没有这样的认识是大不一样的。有了这样的认识，他就能理解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就会摆脱“非黑即白”的单向思维，比较容易接近真理。上山下乡使我们比较深刻地认识了中国的国情，培养了我们的“平民意识”，使我们不由得关注最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也许我们改变不了什么，但是关注本身就是对时代的促进。两位女士在书的最后写道：“对待自己的历史，我们不应似是而非，一笔糊涂账，而应勇敢直面，不管它会勾起多少难堪甚至痛苦的回忆”。书里有许多生动的细节，有激情，有迷茫，让我们感慨和深思。我的“老三届”大嫂因为视力，好久没有读书了。大哥把此书介绍给她，她读完了，问她感想如何，她只说了一句：“写的就是我”。

《动荡的青春》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